政治科學論叢／第 78 期／民國 107 年 12 月／頁 69-104

伊朗核協議對國際核燃料供應建制發展的影響*

曾雅眞**

摘　要

伊朗以核能和平利用爲訴求，主張自我建構核燃料製造的鈾濃縮技術，確保核燃料的供應安全。鈾濃縮乃發展核武的敏感技術，美歐國家憂心，一旦放任此種發展，則有核武擴散之慮。隨著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的簽署與生效，核燃料供應保證的國際造法歷程，意外促成核不擴散建制既有規範的差序化。

回顧不擴散核武器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建制重塑，伊朗核燃料供應保證談判的國際造法歷程，以及美國川普政府試圖重新剝奪伊朗核子能力的議程設定，可以發現，操作核不擴散建制的國際強權，不但可以透過外交談判等權力互動，置入核燃料供應保證的新概念，並且得以運用國際造法，添附 NPT 規範支柱的規範前提，透過規範變異限縮 NPT 非核國核能和平使用的權力；霸權更能恣意以單邊否決手段，去除不符其利的規範安排，爲規範建制的再度重塑，添附更多的運作空間。

關鍵詞：核不擴散、供應保證、出口控制、建制建構、國際造法、規範變異、聯合全面行動計畫

---

* DOI:10.6166/TJPS.201812_(78).0003
本文爲科技部計畫（MOST 106-2410-H-218-007-MY2）之部份研究成果，作者在此特致謝忱。

** 南台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教授，E-mail: paristwo@stust.edu.tw; tsengyeajen@yahoo.com.tw。

收稿日期：107 年 3 月 26 日；通過日期：107 年 11 月 16 日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伊朗與美歐國家的核子爭議，涉及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1] 規範遵循（compliance）的法理基礎，以及各國的安全戰略博奕。探討伊朗核子爭議的相關學術文獻繁多，不過這些分析多奠基於國家戰略與外交談判視角（Mousavian & Mousavian, 2018；Rezaei, 2017；陳文生，2010），對於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重構、國際規範（international norm）消長以及國際造法（international law-making）意涵，鮮有深入的探索。

自 2003 年起，伊朗與美歐國家即就伊朗主張發展鈾濃縮技術所涉及的國際規範，進行長期的博奕。在這場涉及 NPT 建制規範優位的爭辯中，伊朗訴諸 NPT 的核能和平使用原則，主張自我發展核燃料製造的鈾濃縮技術，乃是 NPT 締約國，確保核燃料供應安全的應有權利。美國與英國、法國、德國暨歐盟則憂心，鈾濃縮乃發展核武的敏感技術，一旦放任此種發展，則有核武擴散之慮，因此堅持，滿足核不擴散原則，是核能和平使用的前提。此項核子爭議，不但造就伊朗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5 個常任理事國暨歐盟簽署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並且意外促成核不擴散建制重構，以及核燃料供應保證的國際造法歷程。隨後，美國川普政府於 2018 年退出 JCPOA，再度彰顯霸權恣意重塑規範建制的單方否決樣貌。

本文擬透過國際關係與國際公法的學術對話，探索國際建制變遷與國際規範變異的歷程。首將省思建構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既有線性觀點，接著勾勒核武擴散防阻、核裁軍以及核能和平使用等 3 個 NPT 原則性規範（以下簡稱「規範支柱（pillars）」），梳理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Council, IAEA）核燃料循環多邊化倡議，藉以觀察核燃料供應保證概念的造法歷程，分析歐洲國家爲限縮伊朗發展鈾濃縮技術的法制化成果，突顯 NPT 建制下三個規範支柱的規範變異，最後觀察並省思美國川普政府退出 JCPOA 的國際造法意涵。結論以爲，在伊朗堅持核能和平使用權利主張的衝擊下，操作核不擴散建制的國際強權，不但可以透過外交談判等權力互動，置入核燃料供應保證新概念，並且可以透過國際造法歷

[1] 中華民國政府稱此條約爲《防止核武器蕃衍條約》，聯合國文件稱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但目前絕大部份的中文文獻，已少有採用《防止核武器蕃衍條約》的表述方式。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程，添附核能和平使用原則之規範前提，差序化 NPT 規範支柱之間的均平性，限縮 NPT 非核國核能和平使用的權力；霸權則更能恣意施以單邊否決手段，去除不符其利的規範安排，軟硬兼施，爲規範建制的再度重塑，添附更多的運作空間。

壹、國際建制的構成與規範變異

國際建制乃是針對特定領域議題，約束國家行爲的構成物，以 NPT 條約爲規範核心的核不擴散建制，乃是涉及核武擴散防阻與管制核能和平利用的國際安全建制（Gilligan, 2014；Tate, 1990）。國際關係研究對國際建制的定義繁多。國際建制是國際社會特定領域中，行爲者願望匯集而成的一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則、規則、規範及決策程序（Krasner, 1983: 4-5），它可能是促成國際行爲者合作的中介變數（intervening variables）（Keohane, 1984: 63-64），或是在特定議題領域管制國家政策，達成國家間共同利益的一種多邊安排（Young, 1982a: 2）。另有學者關注國際建制的構成內涵，強調國際建制是一種治理安排，它包含規範性要素（normative element），國家實踐（state practice）以及組織角色（organizational roles）等 3 項組成要素（Kratochwil & Ruggie, 1986: 759）。研究核不擴散建制的泰德（Trevor McMorris Tate）則以爲，國際建制是國際行爲者經由合作、期待與修改特定行爲模式的一系列程序，促成特定目標的權威式安排（Tate, 1990: 402）。透過執行核子保防（safeguard）監督，IAEA 乃是維繫核不擴散建制的重要平台（Tate, 1990: 404）。

國際關係研究對於國際建制的建構與變遷，有 3 種不同的研究途徑。首先，權力主宰途徑認爲，國際建制反映國際秩序的權力構成面貌，它的構建主要歸功於掌握國際社會物質能力優勢之霸權（hegemon）或是主宰國家（dominant actors）（Young, 1982b: 282-285），強權國家可以將本國的利益，轉化爲國際法的規範（Byers, 1999: 35-40），成爲國際建制的核心規則與價值規範。權力主宰論評價，國際組織不過是承載強權利益的產物（Gilpin, 1981: 9），相對地，一旦主導強權步入權力衰微的路徑，國際建制也就面臨崩解的命運（Keohane, 1984: 33-34）。權力主宰觀相信，國際體系的權力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移，同時也會引發國際建制的轉換，以及各種核心價值與規範的更迭（Gilpin, 1981: 35）。另一方面，權力主宰論也導引出另一種看法，認爲只要主導強權常保權力優勢，則特定的國際建制規則，也就會在強權羽翼下永久延續。例如 IAEA 即被視爲是美國霸權的外交工具（Schiff, 1992）。在權力主宰論的看法中，國際建制乃是權力秩序的表徵，強權國家以其優勢權力，建構國際規範，並且調和國際建制運作時所遭遇的規範衝突。霸權可以運用工具化（instrumentalization）、撤銷（withdraw）、重塑（reshape），以及內國法替代（replacement）等 4 種方法，強化維繫其主宰地位的國際法（Krisch, 2005: 381-407；曾雅眞，2007：89）。

國家合作途徑則認爲，國際建制是國際社會行爲者的合作產物，組建國際建制的動機，主要源於國際社會的集體需求（demands）（Keohane, 1982），建構國際建制的過程，乃是一場討價還價的多邊賽局（Young, 1991）。於是，滿足國家間共同利益的國際建制，可以倖存於全球權力轉移的過程，甚至無涉霸權更迭的影響，自我成長茁壯（Keohane, 1984: 237-240）。依據合作論的觀察，國際建制有自我強化的作用，國際建制本身的網絡與規範本身，會提高國際建制的轉型成本；可是一旦國際建制所帶來的負面作用過大，將會引發菁英網絡摧毀國際建制的企圖（Keohane & Nye, 2001: 47）。如此看來，能否滿足參與國的利益，將是國際建制延展與變遷的主要因素。可是國家合作論沒有處理原有合作領域規範衝突的課題，例如核不擴散建制下有關核能和平使用與核子保防措施之間的矛盾如何處理，尺度如何拿捏，值得觀察。

規範擴散途徑是研究國際建制的第三種觀點。社會建構理論（Social Constructivism）認爲，國際建制反映國際社會的特定規範。規範生命周期論（norm life cycle）以爲，國際規範會經過興起階段（emergence of norms），邁向散佈階段（norm cascades），最終進入爲國家所內化（internalization）的狀態（Finnemore & Sikkink, 1998）。螺旋模型（spiral model）主張，國際規範的國際社會化歷程是初始於工具性適應與策略的討價還價；接著進入道德意識上升、爭議、對話與說服階段；制度化和慣習化，成爲規範的最終階段（Risse & Ropp, 2013: 5-9）。規範擴散途徑認爲，國際建制反映特定的國際規範，它是國際社會行爲者接納特定規則的制度化結晶。不過規範周期論與規範螺旋模型所描繪的國際規範內化歷程，受限於線性思維的

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資訊網

僵化定見，以爲單一原則會發展出單一面貌的概念規範，進而依此建構出特定的運作機制（Finnemore & Sikkink, 1998；Risse et al., 2013），並沒有針對規範衝突有更多的著墨，更忽略社會能動者（agent）可以透過社會實踐建構國際規範，進而重塑國際建制的作用（Wendt, 1999）。國際建制可能包容 1 項以上的國際規範訴求，而國際建制參與者的實際過程，可能促成國際建制的規範變遷與轉型。針對國際建制內規範的衍生變異，規範擴散途徑仍有待提出具體的案例與補充觀點。

最後，規範的法制化，對應機制的完備性，以及國家實踐三面向，則是觀察國際建制變異的可行視角。經由法典化正當性所加持的國際規範，乃是國際建制的規範性要素；觀察此項要素的造法成就，將可觀察到該項國際建制的完整樣貌。如某項規範原則，已藉國際造法途徑予以明確地法典化，則相關締約國即有遵循此項法典化之國際規範的義務，例如核燃料供應保證（assurance of supply）原則，已載入 2016 年生效的 JCPOA。此外，單純的規範原則，仍需要透過相關機制的運作輔佐，方能約制參與者行爲，發揮國際建制的預期功能。而是否遵循（comply）國際建制的國家實踐，也是觀察國際建制變遷與規範變異的重要指標。權利義務的模糊、履行機制的不完備，以及時間調適等問題，都是可能促使國家無意遵循國際規範的構成要因（Chayes & Chayes, 1993: 187-197）。

發生於 21 世紀初葉的伊朗核子爭議事件，就是一個 NPT 締約國以核能和平使用權利主張，藉由 IAEA 核子保防機制的不完全遵循，挑戰核不擴散建制的經典案例（Martellini & Zucchetti, 2016: 473）。在此案例中，伊朗試圖說服各方認同，和平使用核能乃是 NPT 建制的普遍性法則，藉此爭取伊朗發展鈾濃縮等敏感性核技術的權力；歐洲國家則扮演規範倡導者（norm entrepreneur），透過規範變異開創外交協調空間。美國則以強制施壓與談判重塑等手段，左右國際造法程序，以維護國家利益。

貳、核不擴散建制的初始建構與規範支柱

不擴散建制是強權國家確保其武力投射優勢，控制盟邦，以及管控核戰風險的重要成就（Kroenig, 2014）。另一方面，核不擴散機制的運作，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映強權建構國際建制，形塑國際規範的國際造法典型案例。冷戰時期相互對峙的美國與蘇聯，在共同利益驅策下，議程設定（agenda-setting）NPT 的談判主軸，在不對稱的談判權力局勢下，塑造核武國家與非核武國家間的對價（*quid pro quo*）權利義務關係（Willrich, 1968: 1509；Joyner, 2009: 9），創建一個約束非核武國家研製核武的國際安全建制。

核不擴散建制是冷戰時代美蘇強權合作的國際造法成果。愛爾蘭在 60 年代冷戰時期，曾連續 3 年提案要求制定防止核武擴散公約（United Nations, 1959a；1960a；1961a），並先後成爲聯合國大會第 1380 號決議與 1576 號決議，呼籲禁止轉讓核武予非核武國家（United Nations, 1959b；1960b）。同是愛爾蘭提案的聯合國大會 1961 年第 1665 號決議，更促請包括美蘇核武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應盡最大的努力締結防止核武擴散條約（United Nations, 1961b）。但愛爾蘭的呼籲並沒有得到美蘇兩強的青睞。美蘇兩國主導的十國裁軍委員會（Ten-Nation Disarmament Committee, TNDC），[2] 並沒有將禁止核武擴散問題納入會議議程（United Nations, 1960b）。即便十國裁軍委員會於 1961 年擴大爲十八國裁軍委員會（Eighteen Nation Disarmament Committee, ENDC），[3] 也沒有處理核武擴散問題。

美蘇兩強對核不擴散的冷淡態度，因爲中國大陸 1964 年成功試爆核彈而出現重大轉變。美蘇兩強開始關切核武擴散至美蘇集團以外國家的嚴重性。美國憂心中國大陸會將核武技術轉移到其他國家。其他國家也會因爲擁有核武，而降低美國的控制力（Burr, 2012），蘇聯更擔心美國會讓西德核武化（Quester, 1972: 24-26）。其次，法國與中國大陸先後於 1960 年與 1964 年完成核子武器研發，也突顯 IAEA 執行核保防效能不彰，凡此皆迫使美國與蘇聯等兩個陷入冷戰對抗的強權國家，在防阻核武擴散議題上進行合作（袁易，2005：105；鄭端耀，2000：43-44），並促成核不擴散概念的法制化，核不擴散建制因此成爲全球核治理的耀眼成果。

2　該機構在聯合國系統以外運作，由法國、蘇聯、英國、美國、保加利亞、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義大利、波蘭以及羅馬尼亞等國組成。

3　十八國裁軍委員會包括原來十國裁軍委員會的 10 名成員，另有巴西、緬甸、衣索比亞、印度、墨西哥、奈及利亞、瑞典與阿拉伯聯合共和國（United Arab Republic）等 8 個不結盟國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美蘇兩國先後自 1965 年起提交 NPT 談判草約，1966 年起，更以 18 國裁軍委員會作爲談判平台，開啓美蘇合作下的 NPT 國際造法進程，映證強權爲共同利益合作推展核不擴散建制的重要意義。1965 年聯合國大會第 2028 號決議設定的 NPT 基本談判原則包括：(1) NPT 應無任何破綻容許核武國家或非核武國家直接或間接藩衍核武器；(2) NPT 對於核武國家或非核武國家之間的相互責任與義務，應訂有可接受之均衡；(3) NPT 應爲普遍與徹底裁軍，尤其是核裁軍的步驟之一；(4) NPT 應訂有可接受並且可行之規定，來確保該約的有效性；(5) NPT 之任何規範，對於任何國家集團締結區域性條約，藉之確保其個別領土內沒有核武器的權利，均不應造成不利的影響（United Nation, 1965）。

國際核不擴散條約於 1968 年 6 月 12 日獲聯合國大會通過，1970 年 3 月 5 日正式生效，計有 11 條規範，旨在約束核武國家與非核武國家間的權利義務關係。NPT 將 1967 年 1 月 1 日前即已製造並進行核爆或其他核爆裝置的國家，定義爲核武國家，反之則是非核武國家（IAEA, 1970: article 9）。NPT 的核心規範包括：第一，確保核武國家不直接或間接地轉讓核武器予非核武國家，也不援助非核武國家製造核武器；第二，非核武國家則保證不製造核武器，不直接或間接地接受其他國家的核武轉讓，不尋求或接受製造核武的援助，也不向他國提供此種援助；第三，停止核軍備競賽與推動核裁軍，以及第四，核能和平使用等。此外，NPT 原訂效期 25 年，後於 1995 年 5 月 11 日舉行的 NPT 審議與延長會議中（1995 Review & Extension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178 個 NPT 締約國決定無限延長 NPT 效期（United Nations, 1995b）。

在 NPT 締約國認可下，防阻核武擴散，核裁軍以及核能和平使用，成爲核不擴散建制的 3 項規範支柱（pillars）（Black-Branch & Fleck, 2014: 93-95；Security Council, 2009；United Nations, 1995a；2010）。

自預防原則出發的防阻核武擴散（De Francia, 2012），是 NPT 最重要的規範支柱。在此目標下，NPT 爲核武與非核武國家劃定對價權利義務關係。亦即，核武國家不得直接或間接向任何國家轉讓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裝置，不得以任何方式協助、鼓勵或引導非核國家製造或取得核武，或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得核武製造權（IAEA, 1970: article 1）。相對地，非核國家則不得收受核武轉讓，不得製造或取得核武，也不得尋求製造核武的任何協助（IAEA, 1970: article 2）。此種權力義務關係的範圍，涵蓋上游的出口控制（export control）、無核區的設置（nuclear- weapon-free Zones, NEFZ），中游的核子保防（safeguard）機制，以及下游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對於違反 NPT 的事後制裁，堪稱是核不擴散建制的首要核心機制。

對於核技術與核設備進行監管的出口控制，乃衍生自核不擴散建制，是 NPT 第 2 條與第 4 條，防止非核武國家取得足以發展核武器各項資材、技術與知識的上游管控措施。主要的構成文件包括：(1) 核供應集團（Nuclear Suppliers Group, NSG）所公告的兩項準則（guideline），以及 (2) 歐盟理事會第 428/2009 號的規定（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428/2009）。

核供應集團成立於 1975 年，旨在協調 NSG 會員國核子資材與技術的出口政策，防止核領域敏感物件的擴散。目前 NSG 計有美國、中國大陸、英國、法國、俄國、日本、南韓等 48 個會員國，歐盟則是 NSG 的觀察員。NSG 分別透過下列 2 項準則對會員國的核子敏感物件實施出口控制：一是「核轉讓準則」（Guidelines for nuclear Transfers），二是「與核有關的兩用設備、材料、軟體和相關技術之轉讓準則」（Guidelines for transfers of nuclear-related dual-use equipment, materials, software, and related technology）。在進口國遵循 IAEA 保防協定（safeguard agreement）的前提下，NSG 準則要求會員國，應實施軍商兩用設備、材料、軟體暨相關技術的出口轉讓許可審批制度。另外，在可能用於非核武國家的核爆活動，未受到核子保防監管的核燃料循環活動，以及存在可能轉用於核武研發或未受保防監管之風險，違反禁止核武擴散宗旨，或存在核子恐怖行爲不可接受的危險時，NSG 準則要求會員國，不得批准出口轉讓核子設備、材料、軟體或相關技術予他方（NSG, 2016: article 2）。

核不擴散建制衍生的另一個出口控制規範爲歐盟理事會 2009 年 5 月 5 日第 428/2009 號規定。此項規定旨在歐盟境內建立無差異的風險評估標準，確保會員國出口控制決策的一致性，藉以減少核擴散的漏洞。主要管制項目是可用於軍商兩用之軟體與技術，包括所有可用於非爆炸性使用，以及以任何方式協助核武生產或其他核爆裝置之貨物（European Union, 2009: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article 1）。凡是列入輸出清單的項目，均需由出口國核發出口執照；未列於附錄清單的品項，如果歐盟會員國的主管機構認爲有所疑慮，或認爲有可能部分或全部用於核生化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裝置，或助其發展、生產、處理、營運、維修、儲存、偵測、辨識或傳播，或可承載此等武器之飛彈的發展、生產、處理、營運、維修或儲存等，或是採購國家或目的地列屬武器禁運國等等，都有必要申請輸出許可執照（European Union, 2009: article 4）。最後，理事會第 428/2009 號規定更要求，歐盟會員國在核發出口執照時，也必需考量下列因素，包括相關國際條約或其在國際限武暨輸出管制安排下所應盡的承諾與義務，強制執行制裁下應盡的歐盟會員國義務，國家外交及安全政策，以及最終使用的意圖與風險等（European Union, 2009: article 12）。

具強制性的 IAEA 保防規範，在 NPT 體系具有及時預警與事後提供制裁事證的作用，是 NPT 能否發揮效能的核心管控機制。NPT 第 3.1 條，要求非核武國家應接受 IAEA 的各項保防監督措施，藉以防止核能自和平用途轉用於核武器或其他核爆裝置。爲此，非核武國家加入 NPT 後，就必須與 IAEA 簽訂定型化的保防協議，亦即所謂的 INFCIRC/153 號文件，將所有的核物料與設施置於 IAEA 的保防管制下（IAEA, 1972: article 3.1）。之後，爲強化保防協議的成效，IAEA 另於 1997 年通過 INFCIRC/540 保防協定補充議定書（additional protocol）（IAEA, 1997），提高核子保防成效。其次，如若 NPT 非核武國家不接受 IAEA 的保防措施，則 NPT 第 3.2 條禁止 NPT 其他國家，向該國出口核材料或是處理、使用或生產此類材料的設備（IAEA, 1970: article 3.2）。爰此，NPT 第 3 條的保防協定或可稱爲 IAEA 條款（袁易，2005：107）。透過定型化的國際協議，IAEA 強制締約方依照 IAEA 律定的查核方式與查核項目，接受 IAEA 的保防查核，以達到事前防範與中期防阻效果，方便 NSG 針對意圖發展核武國家進行管控，並提供安理會作爲制裁決議之事證。

核裁軍爲 NPT 的第 2 項規範支柱，是非核武國家承諾接受保防查核的安全性對價規範。美蘇兩國於 1965 年先後提交的 NPT 談判草約，並未提及核裁軍事項（Joyner, 2013: 17）。1968 年 NPT 談判結束後，透過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255 號決議，美國、英國與蘇聯宣稱將對參加 NPT 的非核武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提供安全保證（Security Council, 1968）。冷戰結束後，1995 年的安理會第 984 號決議，再度重申對 NPT 非核武國家作出下列的安全保證措施：第一，NPT 非核武國家在遭到核武侵略或受到核武侵略的威脅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首先是核武常任理事國，將立即按照《聯合國憲章》的相關規定採取行動；第二，NPT 非核武國家如果遭到核武侵略或核武侵略之威脅，則包括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內的任一國家，均可立即提請安理會注意，並促使安理會得按照《憲章》規定，採取緊急行動，向核武侵略的受害國，或受到核武侵略威脅的國家，提供援助（Security Council, 1995）。不過，NPT 第 6 條的最終條文，只有幾行簡單的規定。各締約國僅允諾將持有談判誠意，早日制訂停止核武競賽與核裁軍之有效措施，並及早訂定在嚴格與有效國際管控下的普遍徹底裁軍條約（IAEA, 1970: article 6）。在冷戰時期，美蘇雖曾達成一些限制核武條約，但是基本上兩國的核武器數量仍然高達一萬枚以上，核裁軍規範形同具文。冷戰結束後，核裁軍也難有突破性的進展。足見核裁軍與安全保證，僅是美蘇在 NPT 談判過程中意圖換取非核武國家接受 IAEA 核子保防管控的對價措施。

最後，核能和平使用爲 NPT 的第 3 項規範支柱，也是非核武國家承諾接受保防查核的另一項對價規範。承前述，核能和平使用原則並非美蘇 1965 年 NPT 談判草約的內容（Joyner, 2013: 17）。有鑑於 NPT 對非核武國家課予不對稱的核子保防義務，非核武國家憂心，未來在核能使用上將會受到更多的限制，因此除了要求核武國提出安全保證外，更要求在 NPT 條文中增列核能和平使用條款（Joyner, 2009: 17-18），此項要求最後爲美蘇所認可，最終納入 NPT 規範。NPT 第 4 條規定，全體 NPT 締約國，均享有爲和平目的研究、生產與使用核能之不可剝奪的權利；並且擁有充分交換核能和平使用之設備、材料，科學與技術情報（IAEA, 1970: article 4）的權利。不過，相較於防止核武擴散的出口控制與 IAEA 核子保防措施，核能和平使用原則僅有幾行簡單的規定，並且未見有相對應的配套機制。足見核能和平使用權利，也是美蘇換取非核武國家接受 IAEA 核子保防管控的對價措施。

伊朗於 2003 年至 2013 年間，爲捍衛其和平研究、生產與使用核能的權利，堅持發展核燃料濃縮技術。不過歐美國家以爲，伊朗此舉乃是發展核武的前奏，如果不能中斷伊朗的核濃縮技術與濃縮鈾數量，則伊朗極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能會突破 NPT 限制，成爲一個核武國家。很明顯地，非核武國家承諾不研製核武的 NPT 義務，以及捍衛核能和平使用的權利之間，存在一個有待填補的灰色地帶。

參、伊朗核開發與供應保證概念的法制化

防阻核武擴散與核能和平使用規範相對的均平關係，隨著伊朗在 21 世紀初期鈾濃縮發展規模的持續擴大，逐漸演變成一項外交衝突。堅持防阻核武擴散凌駕核能和平使用原則的立場之餘，歐洲國家扮演國際造法的規範倡導者，創導核燃料供應保證概念，作爲調和核不擴散與核能和平使用原則間隙的規範性橋樑（Cronberg, 2017: 246-253）。美國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則發動系列國際金融與經濟制裁，壓制伊朗簽署 JCPOA 協議。在容忍伊朗擁有有限的鈾濃縮能力之餘，JCPOA 協議的供應保證機制，構建核不擴散凌駕和平使用核能原則的 NPT 法理優位，促成 NPT 規範層級的實質變異。

一、IAEA 的多邊化供應保證倡議

冷戰結束後，供應發電等核能和平使用的實際需求，因 20 世紀初期的恐攻威脅，備受挑戰。尤其是 2001 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加深國際社會對於核子恐攻的危機意識。[4] 此外，伊拉克等中東國家發展核武的傳聞，也加劇防阻核武擴散的迫切性。爲此，IAEA 秘書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於 2003 年倡議，重新建構核能和平使用概念，將用過核燃料（spent fuel）暨放射性廢物（radioactive waste），以及濃縮鈾與鈽的生產，置於多邊管控之下，試圖均衡核能和平使用與防阻核武擴散的矛盾（ElBaradei, 2003: 48）。巴拉迪的建議，成爲核燃料供應保證機制發展的底蘊。

IAEA 隨後於 2005 年組成專家小組，研究如何在確保核不擴散（Assurance of non-proliferation）的前提下，發展兼顧核燃料供應與服務保證（Assurance

[4] 針對防止恐怖份子取得核生化等大規模殺傷武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 2004 年 5 月 12 日，通過安理會第 1540 號決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f supply and services）的多邊化循環方案（IAEA, 2005a: 5）。專家小組建議，在 IAEA 輔助與監督下，建立國際核燃料的供應保證；並在 NPT 以及非 NPT 締約國的參與下，促進現有設施朝向多邊化的自願轉換，藉此作爲去核武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的基礎（IAEA, 2005a: 15）。IAEA 專家小組的建議，引起多國熱烈回響，先後有 11 項涉及國際核燃料循環多邊化與各種不同型式之供應保證提議（曾雅眞，2012：76-83）。其中法國、德國、荷蘭、俄國、英國和美國提出的核燃料多邊保證概念，主張在正常運行市場外，提供核燃料的雙重供應保證，第一級是透過 IAEA 的多邊供應機制，在接受國滿足核不擴散各項監控要求的前提下，向核燃料供應中斷的接受國提供核燃料；第二級保證則是設立濃縮鈾儲備（reserves），以便在第一級保證失效的情況下，向接受國提供低濃縮鈾（IAEA, 2006d）。值得注意的是，在 IAEA 與多國熱烈討論多邊化供應保證的同時，正是伊朗發展核武爭議逐步升級之際。

二、爭取伊朗讓步的供應保證外交方案

「九一一」恐怖攻擊後，美國小布希總統於 2001 年將伊拉克、伊朗與北韓標誌爲威脅美國安全的邪惡軸心（axis of evil）國。伊朗於 2002 年證實，正在籌建核電廠，並且正在進行相應的核燃料循環規畫；接著伊朗於 2003 年接受 IAEA 訪視時承認，正在進行鈾濃縮計畫，IAEA 並且發現伊朗保有諸多未申報的核材料。僅管伊朗擁有的核材料不足以研製核武器，但已明顯未履行呈報核材料暨鈾轉化加工的核子保防義務（IAEA, 2003）。伊朗可能發展核武的疑雲，由此開啓長達 10 餘年的外交博奕。供應保證概念在此時登場，成爲歐洲國家爭取伊朗信任，要求伊朗放棄發展鈾濃縮技術與再處理（reprocessing）鈽等敏感性措施，同時滿足伊朗核電需求的外交談判對案。

在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的參與下，法德英等歐洲三國，自 2003 年至 2005 年開始展開與伊朗的外交斡旋。三國先於 2003 年 10 月 21 日發佈「德黑蘭聲明」（Tehran Declaration），隨即在 2004 年 11 月 15 日與伊朗簽署「巴黎協議」。此項協議重申 NPT 承諾，歐洲三國／歐盟（即所謂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3/EU）確認伊朗有權依據 NPT，不受歧視地行使與 NPT 義務一致的相對權利。伊朗則重申不尋求獲取核武器，保持充分的透明化，並承諾與 IAEA 合作，於 2003 年 12 月 18 日簽署核子保防附加議定書，並且在附加議定書獲得正式批准之前，自願執行該附加議定書的規定，同時自願暫停包括鈾濃縮與再處理在內的相關活動。歐洲三國/歐盟表示，將開啓與伊朗的談判，以期達成最終協議，確保伊朗的核計畫僅用於和平目的，歐洲三國／歐盟更支持 IAEA 邀請伊朗參與核燃料循環多邊化的專家小組（IAEA, 2004）。伊朗也正面回應此一建議，派遣前駐聯合國與裁軍談判會議納薩理（Cyrus Nasseri）大使，加入 IAEA 的專家小組，並參與核燃料循環多邊化報告的起草與撰寫（IAEA, 2005a: 108）。

可是伊朗與歐洲三國的後續進展並不順利。曾自願暫停鈾濃縮活動並接受 IAEA 保防監控的伊朗，仍試圖爭取在核子保防監督下啓動鈾濃縮活動，發展製造核燃料的鈾濃縮技術並添置離心機設備，歐洲三國則希望能透過供應保證措施，讓伊朗完全放棄鈾濃縮計畫。伊朗強調，發展核能和平使用的相關技術，乃是行使其 NPT 不可割讓的權利，伊朗無需徵求任何同意或就此進行談判。中止鈾濃縮只是一種自願與暫時性的信心建立措施，伊朗反對西方國家迫使伊朗永久放棄核技術的圖謀，宣佈自 2005 年 8 月 1 日起，恢復伊斯法罕（Esfahan）鈾轉化設施的鈾轉化活動（IAEA, 2005b）。

歐洲三國隨後於 2005 年 8 月 5 日在公開致伊朗的「長期協議框架」（Framework for a Long-Term Agreement）初稿中，承諾伊朗在滿足核燃料供應保證的前提下，支持伊朗發展具有防擴散效能的民用核電生產與研究計畫，與伊朗建立全面性的政治、安全暨經濟合作關係（IAEA, 2005c）。

在「長期協議框架」建議案中，歐洲三國／歐盟提出三重核燃料供應保證的構想，試圖換取伊朗同意防擴散的安排。由歐盟／伊朗特設機制（ad hoc mechanism）、緩衝貯備設施（buffer store）與未來 IAEA 多邊服務保證所組成的三重核燃料供應保證機制，將依據正常的市場條件與商業契約，供應伊朗輕水型核子反應器所需的核燃料；惟前提是，伊朗必需遵守包括核安全（nuclear safety）、核安保（nuclear security）、核運輸與返還（return）用過核燃料在內的防擴散安排（IAEA, 2005c: 17）。歐洲三國／歐盟建議，在非關核擴散或核子保防以外的非經濟因素發生，致使未能依據契約向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朗供應核燃料時，歐洲三國／歐盟將與伊朗高級官員舉行特別會議，同時與相關公司舉行會議，審查爲避免伊朗能源短缺所需採取的行動方案。首先，特設機制將努力尋求恢復原先契約的核燃料供應措施，如果此舉失效，則將尋找可能的替代製造商，如果未能確定此類製造商，則將研究在伊朗境外建造新生產線並以市場價格供應伊朗核燃料的可能性。此外，在特設機制運作前，也將尋求在第三國設立足以供應伊朗 5 年核燃料所需數量的緩衝貯備設施。最後，歐洲三國／歐盟並建議，伊朗應與各方共同構建 2005 年三國向 IAEA 提議的核燃料供應安全方案（IAEA, 2005c: 17-19）。

西方國家主張，執行核不擴散的保防措施，是主張核能和平使用權利的先決條件，普遍遵守核子保防附加議定書，才能建立穩定、公開與透明的國際安全環境，而此種環境乃是核能合作的基本要件（NPT, 2005a）。可是伊朗無意爲其核濃縮技術發展，設定任何先決條件，更以爲承諾一般保防協定就已完全履行 NPT 義務。伊朗認爲，面臨以出口控制爲名的政治限制與商業壟斷，發展中國家被剝奪了依據 NPT 第 4 條所享有的核能和平使用權利，因此要求確認：(1) 所有的 NPT 締約國在所有領域，享有發展研究、生產以及使用核能的權利；(2) 所有 NPT 締約國從事已受保防監督的核子活動，包括核燃料循環的國家選擇、決定與政策，都應無歧視地受到尊重；(3) 設立區域性安排，促進與鼓勵核燃料循環領域的經濟與技術合作；(4) IAEA 的作用應充分發揮以確保核燃料的供應，並認可限制核燃料的供應，係違反 NPT 締約國基本義務的作爲；(5) 確保發展中國家能以具有競爭力與公允的條件，不會受到控制，也不會以受到壟斷的價格，取得核燃料；(6) 確保出口控制措施，不得限制或侷限 NPT 締約國進入核燃料市場（NPT, 2005b）。

由於對話各方無法在敏感議題上取得共識，諸如核能和平使用的權利應否受制於核子保防措施，核燃料供應應否受到出口控制等問題，仍然處於僵持狀態，伊朗遂於 2006 年 1 月 10 日宣佈，恢復原本已中止的鈾濃縮活動，停止自願性執行尚未經批准的核子保防附加議定書，但願意就商用鈾濃縮不會轉用至軍事用途事項進行談判（IAEA, 2006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棒子與蘿蔔角力下的供應保證籌碼

歐盟與德國結合中國大陸、法國、俄國、英國暨美國等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即所謂的 P5+1 或者 E3/EU+3），[5] 自 2006 年上半年與伊朗舉行新一輪的談判，惟此項談判並不順利。歐美國家改採獎勵與懲罰交錯的胡蘿蔔棒子（Carrot and Stick）策略，透過一系列的安理會決議，對伊朗施加各種經貿與外交壓力。伊朗另方面也在堅持和平使用與發展核能乃是 NPT 國家應有權利的訴求下，全力擴充鈾濃縮設備，並試射彈道飛彈，營造既成事實，試圖增加談判籌碼。在此過程中，核燃料供應保證概念亦逐步成型，成爲一套涵蓋參與國，儲備緩衝庫與 IAEA 多邊設施的具體規畫。

自 2006 年至 2013 年，伊朗與歐盟暨 P5+1 國家進行長期的外交談判角力。爭議焦點仍然是伊朗主張的核能和平利用權利應否附加任何條件，以及 P5+1 國家願意提供何種替代方案，阻止伊朗建立足以轉用至軍事用途的核能研發能量。2006 年 P5+1 與歐盟建議，與伊朗達成一項涉及核能合作與政治經濟之全面性暨長期性的安排，換取伊朗暫停鈾濃縮與再處理等各項活動，並由 IAEA 進行核查。P5+1 與歐盟重申伊朗擁有不受歧視且爲和平目的發展核能的不可剝奪權利，承諾與伊朗合作，發展民用核能計畫，除了積極支援伊朗建設新的輕水反應器之外，並承諾提供伊朗具有約束力的核燃料多重供應保證，包括：(1) 伊朗可以合作夥伴身份，參與俄國鈾濃縮服務之國際設施，以便伊朗核反應器取得可靠的核燃料供應。上述設施並且可以爲伊朗的所有六氟化鈾進行濃化活動；(2) 在 IAEA 的參與暨監督下，依據商業條件建立緩衝貯存庫，儲存可專供伊朗使用長達 5 年的核燃料供應儲備；(3) 與 IAEA 共同建立一個可靠的核燃料常設多邊機制（IAEA, 2006b）。

但是伊朗堅持，P5+1 應該承認的，是伊朗和平使用核能的權利，而不是向伊朗提供一個不可逆轉與不可撤銷的核燃料供應保證（IAEA, 2006c: 7）。伊朗表示，作爲 IAEA 的成員，伊朗有權依據 NPT 自開發國家獲得核領域

[5] 在談判過程中，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亦參與其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科學、技術、投資暨貿易方面的積極支援，並指責具備核技術能力的對話方，應履行其承諾，消除與伊朗達成全面性協議的一切障礙（IAEA, 2006c）。

在對話無法達成共識的情況下，2006 年 7 月 31 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關於伊朗核問題的第 1696 號決議，對伊朗施加制裁，要求伊朗在 2006 年 8 月 31 日之前，暫停所有與鈾濃縮相關以及再處理的活動，並呼籲伊朗與 IAEA 開展合作關係。伊朗則回應以增設更多的離心機組與加速鈾濃縮活動。此舉引發歐美國家的激烈反應，安理事會復於 2006 年 12 月 23 日通過第 1737 號決議，對伊朗實行一系列的禁運、資產凍結與限制旅行等制裁措施。2007 年 3 月 24 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 1747 號決議，擴大制裁伊朗的核能與飛彈計劃，同時強調以談判解決伊朗核問題的態度。隨著談判進展牛步化，聯合國安理會隨後在 2007 至 2013 年間，先後通過 1747 號、1803 號、1835 號、1929 號、1984 號、2049 號與 2105 號決議，對伊朗實施一系列的制裁。伊朗則是在新總統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的領導下，一方面與 P5+1 國家談判，另外則全力擴充鈾濃縮離心機規模，試射彈道飛彈，陷入缺乏誠信相互探測底線的惡性循環。

不過在壓力下，P5+1 國家與伊朗的接觸並未中止。P5+1 國家一再重申伊朗享有爲和平目的發展、研究、生產與使用核能的權利，理解核燃料供應保證對於伊朗民用核計畫的重要性，不過仍堅持履行 NPT 的保防義務，乃是和平使用核能權利的先決條件（IAEA, 2008a；2008c）。P5+1 國家在 2008 年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第 1803 號決議後重申：(1) 在遵守 NPT 規定義務下，伊朗享有純爲和平目的利用核能的權利；(2) 提供伊朗核能和平利用所需的技術和財政援助，支持恢復 IAEA 對伊朗的技術合作專案；(3) 支援伊朗建造輕水式核反應器；(4) 在國際信任逐步恢復後，支持伊朗推動核能研究與發展活動；(5) 提供伊朗具有約束力的核燃料供應保證；(6) 與伊朗開展管理用過核燃料與放射性廢物的合作（IAEA, 2008c: 1）。

安理會在 2009 年的 1887 號決議中，認可 IAEA 構建包括核燃料供應保證在內的核燃料循環多邊化措施，不僅得以滿足核燃料的供應與服務需求，同時也是降低核武擴散風險的有效手段，並敦促 IAEA 儘快就此商定各項措施（Security Council, 2009）。

伊朗則要求，伊朗應擁有相關技術，並成爲核燃料供應保證機制的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應方。伊朗於 2008 年 6 月 16 日表示，伊朗可以作下列考量。第一，取得不轉移核活動的進一步保證。第二，在包括伊朗在內的不同區域，建立鈾濃縮與核燃料生產的政府組合實體（consortiums）。第三，促進各國獲得和平利用核技術的合作，並爲各國應用此種技術提供便利（IAEA, 2008b）。伊朗另於 2010 年 3 月 1 日說明，由於西方國家拒絕履行向伊朗提供核物質的契約，扣押伊朗購買的六氟化鈾，以及拒絕伊朗入股國際鈾濃縮企業等前例，造成伊朗無法輕信西方國家提出的供應保證機制（IAEA, 2010）。

四、JCPOA 與供應保證機制的國際規約化

魯哈尼（Hassan Rourani）於 2013 年繼任伊朗總統，開啓伊朗與 P5+1 國家間的最終妥協。經歷長久的談判後，伊朗首先於 2013 年 11 月 24 日在日內瓦與 P5+1 國家商定「聯合行動計畫」（Joint Plan of Action），各方採取停止制裁與停止鈾濃縮的自願性措施，並且擬就輕水反應器、研究型核反應器及相關設備、核燃料供應以及研發等國際民用核能合作事項，籌畫細部的最終談判協議（IAEA, 2013）。

伊朗與 P5+1 國家於 2015 年 7 月 14 日達成 JCPOA，並於 2016 年 1 月 16 日生效實施。這份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2231 決議背書的國際協議，締約方承諾將全面解除涉及伊朗核事件的安理會制裁、多邊制裁與各國的制裁。相對地，伊朗則承諾：(1) 放棄發展再處理（reprocessing）用過核燃料的設備與技術能力；(2) 將所有的用過核燃料運出伊朗，進行進一步的處理或最終處置；(3) 縮減六氟化鈾（UF6）的低濃縮鈾庫存量爲 300 公斤，其鈾濃度不能超過 3.67%；(4) 轉換福爾多（Fordow）的鈾濃縮工廠爲同位素生產設施，停止在該設施進行濃縮鈾的活動與研究；(5) 重新設計阿拉克（Arak）的重水反應器，降低功率，使其不能生產武器級鈽，伊朗也不再累積重水，所有多餘的重水將交付國際市場販售；(6) 伊朗可以進行鈾濃縮研究，不過只限在納坦茲（Natanz）的核設施內進行，並且未來 10 年只能允許不超過 5,060 部離心機，提煉濃度不超過 3.67% 的濃縮鈾；(7) JCPOA 將設立一個由歐盟、P5+1 國家與伊朗組成的聯合委員會，以監督 JCPOA 的執行，履行 JCPOA 的規定；(8) 執行核子保防措施附加議定書，接受高規格的 IAEA 監管（Security Council, 2015: 21-34）。

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JCPOA 在序言中確認，NPT 是核不擴散建制的基石，同時是追求核裁軍與和平利用核能的根本基礎；JCPOA 的成功執行，將會讓伊朗在符合 NPT 義務的情況下，享有 NPT 核能和平發展之相關權利，伊朗的核計畫將享有與 NPT 其他非核武國家的相同待遇（Security Council, 2015: 9）。此種表述方式，無異已經表明，防阻核擴散乃是凌駕核能和平使用之規範支柱，在不能滿足核不擴散核子保防措施的前提下，任何 NPT 非核武國家將不具備發展核子技術的正當性。

伊朗製造核武能力受到 JCPOA 協議的嚴格限制。依據 JCPOA 協議，伊朗承諾在 2025 年以前只能擁有有限的鈾濃縮能力，接受嚴格的核子保防監管，並承諾放棄再處理技術，將所有的用過核燃料移至國外進行處理（treatment）或是最終處置（disposition），僅保留有限的基礎性鈾濃縮研究能量，並且相關的研究設施，也遠遠未及產出武器級鈾（Security Council, 2015: 12）。JCPOA 附件 4 明載，P5+1 國家將協助伊朗購置輕水型研究反應器，用於研發、測試、發電與海水淡化，並按相關契約，完備核燃料供應保證與移除用過核燃料的安排（Security Council, 2015: 12）。

隨著 JCPOA 簽署生效，自 2003 年開展的核燃料供應保證國際造法歷程，終於瓜熟蒂落，成爲 NPT 規範的另一個重要構成，確認核不擴散凌駕核能和平使用原則的法理優位，自均平性到差序化，重塑 NPT 建制兩大規範支柱之間的規範層級。

肆、美國川普政府的單邊否決

簽署並在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JCPOA 協議，乃是美國歐巴馬政府優位化核不擴散原則，確認滿足核保防是和平使用核能前提要件的重大成就。可是繼任歐巴馬的美國川普總統，並不以此爲滿足，他採取霸權單邊否決手段，試圖壓制伊朗地緣政治勢力，全面剝奪伊朗得擁有敏感性民用核技術的有限核能和平利用空間。

首先，美國歐巴馬政府雖簽署 JCPOA，但並未廢止制裁伊朗的各項美國內國法，爲美國日後單邊拒絕履行國際協議開啓後門。美國國會並不贊成美國加入 JCPOA，但由於反對票未達到攔阻美國總統行使立法否決權的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三分之二國會絕對多數，故而國會只能退讓。不過，2015 年的「伊朗核協議審議法案」（Iran Nuclear Agreement Review Act, INARA），在「1954 年原子能法」（The Atomic Energy Act of 1954）增列第 135 條，授權美國總統得透過有限豁免（waiver），暫停美國內國法對伊朗所實施的各項制裁，爲美國片面終止執行 JCPOA 埋下伏筆。INARA 要求美國總統必須每隔 90 天通知國會確證（certify）伊朗已確行履行下列要求：

1. 伊朗已確實執行 JCPOA；
2. 伊朗未重大違約（material breach）；
3. 伊朗未採取推進核武計畫之任何行動；
4. 暫停對伊朗制裁，須相當於伊朗所採行的措施並且符合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United States Congress, 2015）。

川普總統則施壓歐盟與英國、法國暨德國等 JCPOA 締約方，要求重啓談判，另訂 JCPOA 補充協定，架空 JCPOA。美國川普總統在 2016 年總統競選期，即表達對於美國加入 JCPOA 的不滿。就任美國總統後，雖仍依循歐巴馬總統往例，向國會通報制裁伊朗之豁免，但言談間仍有諸多保留。2017 年 10 月 13 日，川普總統界定伊朗研發彈道飛彈、財務支持恐怖極端份子、支持敘利亞阿塞德政權以及敵對以色列等作爲，乃是威脅美國與區域安全，故而傾向不再進行豁免伊朗制裁之確證（White House, 2017）。英國、法國與德國隨即發佈聯合聲明，除矢言履行 JCPOA 承諾，並敦促川普總統與美國國會注意不履行 JCPOA 對美國安全利益的影響外，三國亦表達對伊朗彈道飛彈計畫與區域作爲的關切，並預備就此採取必要行動，與美國進行合作（United Kingdom, 2017）。在此期間，美國與歐洲國家即已就一項沒有落日條款的補充協定（supplement agreement）展開協商（White House, 2018a）。2018 年 1 月 12 日，川普總統於宣佈，爲促使歐洲盟友同意修補 JCPOA 的嚴重漏洞（terrible flaws），美國此次豁免制裁，但屬下不爲例（White House, 2018a）；藉此向英、法、德三國施壓。

由於未能說服歐洲國家簽署 JCPOA 補充協議，川普政府於 2018 年 5 月 8 日宣佈退出 JCPOA，恢復美國對伊朗的各項單邊制裁（White House, 2018b），企圖升高歐洲國家維持 JCPOA 的經貿成本，迫使歐洲國家讓步。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美國重啓對伊朗制裁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 90 天過渡期結束後，於 2018 年 8 月 6 日啓動，主要是禁止美國法人／個人與伊朗進行汽車暨美元現金交易等商業行爲。第二階段制裁則是在 180 天過渡期之後，將於 2018 年 11 月 4 日重啓，包括與伊朗石油公司與伊朗銀行金融服務在內的各種涉及非美國人第三方與伊朗貿易的各項制裁措施（Department of Treasure, 2018）。換言之，一旦美國恢復制裁伊朗，則依據 JCPOA 與伊朗進行商業金融活動的歐洲或其他第三方公私企業法人／個人，不免因爲違反美國法律，而有受到美國懲處之虞，更將危及這些公私企業法人／個人與美國的貿易與金融服務活動。就此，英法德三國外交部長於 2018 年 6 月 4 日，致函美國國務卿與財政部長，要求對三國企業實施制裁豁免（United Kingdom, 2018b），但爲美國所拒絕（NBC, 2018），意謂歐洲企業必須爲歐洲國家維護 JCPOA 的堅持，連帶付出代價。

爲維護歐盟企業的商業利益，以及執行 JCPOA 的國際威信，歐盟採取補救措施，藉以維護與伊朗從事合法交易的歐洲企業，不受到美國重啓對伊朗實施單邊制裁域外效力（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的影響。爲此，歐盟修正 1996 年理事會第 2271/96 規則（Council Regulation No 2271/96 of 22 November 1996），並於 2018 年 8 月 6 日生效，藉此免除歐盟企業遵從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法令，補償歐盟企業因爲受到美國法律懲處的損失，無效化任何外國法庭對歐盟企業的不利判決（European Commission, 2018）。不過，此項補救措施的成效如何，仍有待長期的觀察。

由此觀察，美國川普政府以單邊手段，抗拒多邊形式所創造的國際規範，製造霸權更多恣意活動的空間，向執行 JCPOA 的歐洲暨第三方國家施加苦楚與實質損害，迫使這些國家走向美國所指定的修約造法道路，目的在滿足美國個別的國家利益。歐盟與英法德三國的作爲看似與川普政府成爲攻守之勢，不過，究其目的，似與美國有異取同工之妙。歐洲與美國的主要爭議並非在於，是否容許伊朗擁有更多的敏感性核技術能力，而是如何自 JCPOA 中取得或者維護歐洲企業的利益。

最後，美國劃定取代 JCPOA 另起爐灶重新談判的新議程，壓迫歐洲國家與伊朗放棄 JCPOA 所賦予的權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於 2018 年 5 月 21 日提出撤除制裁伊朗的 12 項條件，構成未來美歐伊朗談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圖書資料庫

判的議程：

1. 向 IAEA 申報軍事核能計畫，並透過永久暨可驗證（permanently and verifiably）的方式放棄相關活動；
2. 停止提煉濃縮鈾並且永不進行再處理提煉鈽的活動，包括關閉重水反應爐；
3. 允許 IAEA 進入伊朗全境各地查核；
4. 停止彈道飛彈擴散，不再研製或發射能夠攜載核武的飛彈系統；
5. 釋放伊朗非法起訴並拘禁的美國暨其盟邦公民；
6. 停止對包括黎巴嫩眞主黨、巴勒斯坦「哈瑪斯」（Hamas）與「伊斯蘭聖戰組織」（Islamic Jihad）、阿富汗「神學士」（Taliban）在內的恐怖組織之協助；
7. 尊重伊拉克主權，解除在伊國的什葉派武裝力量；
8. 停止支援胡塞組織（Houthi），並協助在葉門實現和平的政治解決方案；
9. 撤出敘利亞境內所有受伊朗指揮的部隊；
10. 停止支持阿富汗塔利班恐怖組織，停止蔽護基地組織；
11. 停止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軍（Qods Force）對全球恐怖份子與武裝夥伴的援助；
12. 停止威脅鄰國的行爲，包括消滅以色列、向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發射飛彈（Department of State, 2018）。

蓬佩奧所提出的 12 項條件，是美國川普政府全面剝奪伊朗核能力與區域影響力的議程設定，意在重塑相關規範，排除和平使用核能原則在 NPT 建制的存續，全面關閉非核國得擁有製造核武之敏感性民用核技術的空間，進而限縮伊朗在中東地區的地緣戰略實力，維護美國盟邦以色列暨沙烏地與伊朗分庭抗禮的佈局。

法德英於 2018 年 5 月 8 日聯合聲明，強調三國對 JCPOA 的承諾，突顯伊朗對於 IAEA 保防監督與 JCPOA 的遵約行爲，敦促美國不要阻止 JCPOA 的執行（United Kingdom, 2018a）。在支持 JCPOA 的同時，三國也認爲必需持續 JCPOA 落日條款於 2025 年終止的後續安排，處理伊朗研發彈道飛彈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與破壞中東區域穩定的隱憂，並且將與相關國家合作就此議題進行協商（United Kingdom, 2018a）。歐洲國家已陷入美國劃定的規範重構議程框架，其與伊朗如何掙脫這個議程陷阱，仍待更多軟實力的折衝與硬實力的背書。

美國川普政府對伊朗的全面性制裁，將於 2018 年 11 月初啓動。在此之前，美國、伊朗、與歐盟等各造，仍在國際組織相互交鋒。伊朗代表沙列西（Ali Akbar Salehi）於 2018 年 9 月 17 日在第 62 屆 IAEA 年會上強調，伊朗自 2016 年即已忠實履行 JCPOA，美國川普政府單方退出 JCPOA 的單方作爲，非但扭曲國際公法與國際多邊主義，危害 JCPOA 的成就，更會對國際與區域的和平安全，造成嚴重影響（IAEA, 2018）。歐盟也在 2018 年 9 月 24 日於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召集伊朗、英國、法國、俄國、中國大陸與德國外交部長，舉行部長級會議，重申 JCPOA 的重要性，肯定伊朗履行 JCPOA 承諾，並建議設立「特別目的載體」（Special Purpose Vehicle），便利歐洲國家與伊朗得持續進行各項金融與商務活動，藉以降低美國對伊朗重啓制裁的衝擊（European Union, 2018）。美國總統川普則於 2018 年 9 月 26 日，藉擔任聯合國安理會主席之便，指責伊朗向外輸出恐怖主義製造區域動盪，辯解美國退出 JCPOA 並重啓制裁伊朗的舉措，呼籲聯合國會員與美國合作，共同確保伊朗永遠不會取得核武；並且威嚇，不遵守美國對伊朗制裁的任何人，都將面臨嚴重的後果（White House, 2018c）。諷刺地是，IAEA 秘書長也在同一時間向聯合國安理會主席提交報告，聲明 IAEA 將持續查核並監測伊朗履行 JCPOA 承諾，明言未發現伊朗已申報之核材料有轉用的事實，但也技巧性地留下伏筆，將持續評估伊朗是否存在沒有申報核材料與核活動之情事（Security Council, 2018）。歐盟肯定伊朗對 JCPOA 遵約，美國單方退出 JCPOA 並且重啓對伊朗制裁的事實，再度突顯 NPT 核不擴散原則優於核能和平使用原則的規範變異，剝奪 NPT 非核武國家依約得發展並擁有鈾濃化與再處理等敏感技術的絕對權利。

伍、結論

以防阻核武擴散爲核心的 NPT 建制，是國際社會的指標性安全建制，自 1970 年代運作至今，雖有不同的評價，但密實核子保防監管，強化核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料與核設備出口控制，以及對違逆 NPT 國家施以安理會制裁的堅決態度，至今未有絲毫退讓的跡象。此種現象反映，國際社會主要強權仍然支持核不擴散建制的堅定立場，禁阻非核武國家擁有核武的相關配套運作機制，不僅日趨嚴謹，更有逐步擴大管制範疇，強化約制功能的趨向。

相較之下，同樣作爲 NPT 的規範支柱，核裁軍原則卻飽受冷落。美國川普總統 2018 年發佈「核態勢評估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宣稱仍維持以核武爲基礎的嚇阻戰略，視中國大陸、俄國、北韓與伊朗爲核武威脅來源，指責中國大陸與俄國擴充核武數量，更企圖部署低當量核武，更新美國的核武軍火庫，應對美國的核武暨非核武威脅（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易言之，國際社會雖於 2017 年通過禁止核武條約（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但是全球核裁軍的趨勢並不樂觀。

NPT 另一項規範支柱，核能和平使用原則，更受到核不擴散規範的擠壓，被施以核子保防爲前提的額外制約。伊朗自 2003 年起，即主張所有 NPT 非核武國家均有和平使用核能的權利，並且此項權利不應被加諸額外的束縛。不過國際社會的強權國家，顯然不同意 NPT 三項規範支柱具有對等之優位性，以爲滿足核子保防監管機制，完備防阻核武擴散的先期預防措施，應該凌駕核能和平使用原則之上。

爲均衡防阻核武擴散與核能和平使用兩項原則，IAEA 發展出核燃料多邊化概念，企圖透過建立核燃料供應保證機制，化解 NPT 非核武國家籌建本土鈾濃縮與再處理等核燃料製造技術暨相關設施的必要性。IAEA 倡議的核燃料供應保證機制，巧妙地包裝了申請方應事先滿足核子保防查核之核不擴散規範的優位性，削弱了 NPT 核能和平使用原則的完整性，誘使非核武國家放棄鈾濃縮與再處理等敏感性核技術。

自 2003 至 2015 年簽署 JCPOA，伊朗爭取發展鈾濃縮與再處理等敏感性核技術的努力，雖以暫時退讓告終，卻意外促成核燃料供應保證的國際造法歷程。新興的核燃料供應保證概念，差序化 NPT 原有規範支柱之規範順位，添附核能和平使用原則的規範前提，限縮核能和平使用原則的應用範疇，重塑核不擴散建制優位的操作安排，並以此創建核燃料銀行的實體運作模式，構成外交實踐變異國際規範的最佳範例，更顯示以和平使用核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能規範相爭的對手國，並未能在國際組織內發揮軟性抗衡（soft balancing）的預期效果。

但顯然這種隱性並且有條件允許 NPT 非核國擁有敏感性核技術，優位化核不擴散原則的建制安排，仍不爲美國川普政府所接納。美國以內國單邊手段否決 JCPOA，重啓伊朗核爭議，加劇歐洲國家維護 JCPOA 的實質損害，並由此畫定下一波的談判議程，已爲重構國際規範的國際造法進程，鋪設符合霸權利益的路徑。不過，研究也發現，川普政府與歐洲國家的 JCPOA 爭議，似乎只有禁絕核武發展手段的鬆緊之別，以及 JCPOA 能否滿足自身利益的歧見，伊朗不過是 NPT 建制內規範變異的祭品。

回顧伊朗核談判的國際造法歷程，以及美國川普政府事後企圖重新剝奪伊朗核子能力的霸權否決作爲，可以發現，初始創建核不擴散建制的國際強權，不但可以透過外交談判等權力互動，置入核燃料供應保證新概念，並且運用國際造法，添附核能和平使用原則的規範前提，差序化國際建制內的規範原則；霸權更能恣意以單邊否決手段，去除不符其利的規範安排，爲規範建制的再度重塑，添附更多的運作空間。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袁　易，2005，〈『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之再審視：一個權力政治與身份政治的解析〉，《問題與研究》，44(4): 101-150。Yun, I. 2005. "'Bukuosan hewuqi tiao yue' zhi zaishenshi: yige quanli zhengzhi yu shenfen zhengzhi de jiexi" [The NPT Revisited: An Analysis of Power and Identity Politics]. *Issues & Studies* 44(4): 101-150.

陳文生，2010，〈人面獅身霸權與核不擴散典則：美國對北韓、伊朗及伊拉克核擴散之處理〉，《政治科學論叢》，43: 83-118。Chen, Wen-sheng. 2010. "Renmian shishen baquan yu hebukuosan dianze: meiguo dui beihan, yilang ji yilake hekuosan zhi chuli" [The Sphinxic Hegemony and the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Explaining the American Approach to Nuclear Proliferation in North Korea, Iran, and Iraq].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3: 83-118.

曾雅眞，2007，〈從議程設定論國際經貿規範之法制化：以「市場擾亂」概念的發展與演化爲例〉，《問題與研究》，40(3): 85-124。Tseng, Yea-jen. 2007.

臺灣人文及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Cong yicheng sheding lun guoji jingmao guifan zhi fazhihua: yi 'shichang raoluan' gainian de fazhan yu yanhua weili" [Market Disrup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Processes of Legalization: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enda-Setting]. *Issues & Studies* 40(3): 85-124.

曾雅眞，2012，〈和平利用核能之國際造法趨勢－IAEA 核燃料循環多邊化倡議的實踐與影響〉，《問題與研究》，51(2): 69-100。Tseng, Yea-jen. 2012. "Heping liyong heneng zhi guoji zaofa qushi ─IAEA heranliao xunhuan duobianhua changyi de shijian yu yingxiang"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Trends on Peaceful Usage of Nuclear Energy –Practice and Influence of IAEA Multilateral Nuclear Fuel Cycle Advocacy]. *Issues & Studies* 51(2): 69-100.

鄭端耀，2000，〈核不擴散建制的運作與發展〉，《問題與研究》，39(4): 41-76。Cheng, Tuan-Y. 2000. "Hebukuosan jianzhi de yunzuo yu fazhan" [An Appraisal of the Functions and Practices of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Issues & Studies* 39(4): 41-76.

二、西文部分

Black-Branch, J. L. & D. Fleck. 2014.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I*. The Hague: T. M.C. Asser Press.

Burr, W. 2012. "New Documents Show US Feared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Technology in 1960s." in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new-documents-show-us-feared-proliferation-nuclear-technology-1960s.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Byers, M. 1999. *Custom, Power and the Power of Rul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yes, A. & A. H. Chayes. 1993. "On Compli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2): 175-205.

Cronberg, T. 2017. "No EU, No Iran Deal: The EU's Choice between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Transatlantic Link.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24(3/4): 243-259.

De Francia, C. 2012. "Enforcing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The Legality of Preventive Measures."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45(3): 705-783.

Department of Treasure. 2018. "Iran Sanctions." in 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Programs/Pages/iran.aspx.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ElBaradei, M. 2003. "Towards a Safer World." *The Economist* 369(8346): 47-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Updated Blocking Statute in Support of Iran Nuclear Eeal Enters Into Force (Brussels, 6 August 2018).” in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8-4805_en.htm. Latest update 06 December 2018.

European Union. 2009.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428/2009 of 5 May 2009 Setting up a Community Regime for the Control of Exports, Transfer, Brokering and Transit of Dual-use Items (Recast).” in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02009R0428-20161116&from=EN.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European Union. 2018. “Implementation of the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in https://eeas. europa.eu/delegations/iran/51036/implementation-joint-comprehensive-plan-action-joint-ministerial-statement_en.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Finnemore, M. & K. Sikkink. 1998.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4): 887-917.

Gilligan, K. 2014. “The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and the NPT.” In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I,* eds. Jonathan L. Black-Branch & Dieter Fleck. The Hague: T. M.C. Asser Press, 85-104.

Gilpin, R. 1981. *War and Chang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AEA. 1970.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INFCIRC/140 22 April 1970).” in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1970/infcirc140.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IAEA. 1972.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Agreements Between the Agency and States Requi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INFCIRC/153).” in http://www.iaea.org/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Others/infcirc153.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IAEA. 1997. “Model Protocol Additional to the Agreemehnt(s) between States(s) and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for the Appliction of Safefuards (INFCIRC/540) (Corrected).” in http://www.iaea.org/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1997/infcirc540c.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IAEA. 2003. “Implementation of the NPT safeguards agreement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GOV/2003/40, 6 June 2003).” in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gov2003-40.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IAEA. 2004. “Communication dated 26 November 2004 Received from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France, Germany,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Concerning the Agreement Signed in Paris on 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November 2004 (INFCIRC/637, 26 November 2004).” in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2004/infcirc637.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IAEA. 2005a. “Multilateral Approaches to the Nuclear Fuel Cycle: Expert Group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NFCIRC/640).” in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2005/infcirc640.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IAEA. 2005b. “Communication Dated 1 August 2005 Received from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the Agency (INFCIRC/648, 1 August 2005).” in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2005/infcirc648.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IAEA. 2005c. “Communication Dated 8 August 2005 Received from the Resident Representatives of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o the Agency (INFCIRC/651, 8 August 2005).” in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2005/infcirc651.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IAEA. 2006a. “Communication Dated 24 January 2006 Received from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the Agency (INFCIRC/665, 31 January 2006).” in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2006/infcirc665.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IAEA. 2006b. “Communication Dated 14 July 2006 Received from the Resident Representative of France to the Agency (INFCIRC/676, 14 July 2006).” in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2006/infcirc676_fr.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IAEA. 2006c. “Communication Dated 6 November 2006 Received from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the Agency (INFCIRC/685, 8 November 2006).” in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2006/infcirc685.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IAEA. 2006d. “Communication Dated 31 May 2006 Received from the Permanent Missions of France, Germany, the Netherlands,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 June 2006. GOV/INF/2006/10).” in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98987.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IAEA. 2008a. “Communication Dated 4 March from the Governor fo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Resident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France, Germany,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ncerning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803 (2008) (INFCIRC/723, 5 March 2008).” in http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2008/infcirc723.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IAEA. 2008b. "Communication Dated 16 June 2008 Received from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the Agency Concerning the Tex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s Proposed Package for Constructive Negotiation (INFCIRC/729, 18 June 2008)." in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2008/infcirc729.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IAEA. 2008c. "Communication Dated 25 June 2008 Received from the Resid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ted Kingdom to the Agency Concerning a Letter and offer of 12 June 2008 Delivered to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NFCIRC/730, 1 July 2008)." in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2008/infcirc730.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IAEA. 2010. "Communication Dated 1 March 2010 Received from the Resid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the Agency Regarding Assurances of Nuclear Fuel Supply (INFCIRC/785, 2 March 2010)." in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2010/infcirc785.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IAEA. 2013. "Communication Dated 27 November 2013 Received from the EU High Representative Concerning the Text of the Joint Plan of Action (INFCIRC/855, 27 November 2013)." in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2013/infcirc855.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IAEA. 2015. "IAEA and Russia Sign Transit Agreement for IAEA Fuel Bank, (June 18 2015)." in https://www.iaea.org/newscenter/news/iaea-and-russia-sign-transit-agreement-for-iaea-fuel-bank.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IAEA. 2018. "Statement by H. E. Dr. Ali Akbar Salehi Vice President and Head of the Atomic Energy 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t the 62nd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Vienna, 17 September 2018)." in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18/09/gc62-iran-statement.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Joyner, D. 2013. *Interpreting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yner, D. H. 2009.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eohane, R. O. & J. S. Nye. 2001.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Longm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eohane, R. O. 1982.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2): 325-355.

Keohane, R.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New J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rasner, S. D. ed. 1983.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ratochwil, F. & J. G. Ruggie. 1986.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 State of the Art on an Art of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4): 753-775.

Krisch, N. 2005. “International Law in Times of Hegemony: Unequal Pow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6(3): 369-408.

Kroenig, M. 2014. “Force or Friendship? Explaining Great Power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23(1): 1-32.

Martellini, M. & M. Zucchetti. 2016. “The Iranian Nuclear Agreement: A Scientifically Reliable, Transactional and Verifiable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In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III Legal Aspects of the Use of Nuclear Energy for Peaceful Purposes,* eds. Jonathan L. Black-Branch & Dieter Fleck. The Hague: T. M.C. Asser Press, 471-488.

Mousavian, S. H. & M. M. Mousavian. 2018. “Building on the Iran Nuclear Deal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Journal for Peace and Nuclear Disarmament* 1(1): 169-192.

NBC. 2018. “U. S. Refuses European Requests for Exemptions from Its New Sanctions on Iran (July 14).” in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u-s-refuses-european-requests-exemptions-its-new-sanctions-iran-n891371.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NPT. 2005a. “Articles III (3) and IV, Preambular Paragraphs 6 and 7, Especially in their Relationship to Article III (1), (2) and (4) and Preambular Paragraphs 4 and 5 (Cooperation in the Peaceful Uses of Nuclear Energy)-Working Paper for Submission to Main Committee III by Australia, Austria, Canada, Denmark, Hungary, Ireland, the Netherlands, New Zealand, Norway and Sweden (2005 Review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CONF.2005/WP.11, 26 April 2005).” in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05/324/60/PDF/N0532460.pdf?OpenElement.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NPT. 2005b.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Energy- Working Paper Submitted by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for Main Committee III (2005 Review Conferenc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f the Parties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CONF.2005/WP.50. 19 May 2005).” in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05/350/68/PDF/N0535068.pdf?OpenElement.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NSG. 2016. “Guidelines for Transfers of Nuclear-related Dual-use Equipment, Materials, Software, and Related Technology (INFCIRC/254/Rev.10/Part 2).” in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1978/infcirc254r10p2.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Quester, G. H. 1972. “Soviet Policy on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5(1): 17-34.

Rezaei, F. 2017. *Iran's Nuclear Program: A Study in Proliferation and Rollback.*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Risse, T. & S. C. Ropp. 2013.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In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eds. Risse Thomas, Stephen C. Ropp & Kathryn Sikki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25.

Risse, T., S. C. Ropp & K. Sikkink. 2013. *The Persistent Power of Human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iff, B. N. 1992. “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 U. S. Rela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Patterns of Changing Instrumentality and Influence*, eds. Margret P. Karns & Karen A. Mingst. New York: Routledge, 39-61.

Security Council. 1968.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55 (1968) on Measures to Safeguard Non-nuclear-weapon States Parties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S/RES/255(1968). 19 June 1968).” in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90759/files/S_RES_255%281968%29-EN.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Security Council. 1995. “Use of Nuclear Weapons S/RES/984 (1995).” in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RES/984(1995).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Security Council. 2009. “Resolution 1887 (2009) Adopt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6191st meeting, on 24 September 2009 (S/RES/1887) (2009).” in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RES/1887(2009).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Security Council. 2015. “Resolution 2231 (2015) Adopt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7488th meeting, on 20 July 2015 (S/RES/2231) (2015).” in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RES/2231%20(2015). Latest updat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 December 2018.

Security Council. 2018. "Letter Dated 30 August 2018 from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S/2018/835. 12 September 2018)." in https://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CF9B-6D27-4E9C-8CD3-CF6E4FF96FF9%7d/S_2018_83.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Tate, T. M. 1990. "Regime-Building in the Non-Proliferation System."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7(4): 399-414.

United Kingdom. 2017. "Declaration by the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of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13 October 2017)." i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declaration-by-the-heads-of-state-and-government-of-france-germany-and-the-united-kingdom.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United Kingdom. 2018a. "Joint Statement from Prime Minister May, Chancellor Merkel and President Macron Following President Trump's Statement on Iran (8 May 2018)." i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joint-statement-from-prime-minister-may-chancellor-merkel-and-president-macron-following-president-trum%E2%80%A6.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United Kingdom. 2018b. "Joint E3 Letter to Steven Mnuchin and Mike Pompeo on JCPOA (6 June 2018)." i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joint-e3-letter-to-steven-mnuchin-and-mike-pompeo-on-jcpoa.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United Nations. 1959a. "Report of the 1st Committee (A/4286, 18 November 1959)." in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841872/files/A_4286-EN.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United Nations. 1959b. "Prevention of the Wider Dissemin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RES/1380) (XIV) (20 November 1959)." in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206353/files/A_RES_1380%28XIV%29-EN.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United Nations. 1960a. "Report of the 1st Committee (A/4680. 20 December 1960)." in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844743/files/A_4680-EN.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United Nations. 1960b. "Prevention of the Wider Dissemin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RES/1576) (XV) (20 December, 1960)." in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205865/files/A_RES_1576%28XV%29-EN.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United Nations. 1961a. "The Prevention of the Wider Dissemination of Nuclear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eapons: Report of the 1st Committee (A/5002. 1 December. 1961).” in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841228/files/A_5002-EN.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United Nations. 1961b. “Prevention of the Wider Dissemin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RES/1665) (XVI), (4 December 1961).” in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1665(XVI).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United Nations. 1965. “Resolution on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RES/2028) (XX).” in http://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203465/files/A_RES_2028%28XX%29-EN.pdf?version=1.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United Nations. 1995a. “Decision 2-Principles and Objective for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Disarmament (1995 NPT Review and Extension Conference).” in https://unoda-web.s3-accelerate.amazonaws.com/wp-content/uploads/assets/WMD/Nuclear/1995-NPT/pdf/1995-NY-NPTReviewConference-FinalDocumentDecision_2.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United Nations. 1995b. “Decision 3-Principles and Objective for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Disarmament (1995 NPT Review and Extension Conference).” in https://unoda-web.s3-accelerate.amazonaws.com/wp-content/uploads/assets/WMD/Nuclear/1995-NPT/pdf/NPT_CONF199503.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United Nations. 2010. “Final Document of the 2010 NPT Review Conference, Part I-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ollow-on Actions (NPT/Conference 2010/50, Vol. I).” in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NPT/CONF.2010/50%20(VOL.I).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United States Congress. 2015. “Iran Nuclear Agreement Review Act of 2015 (Public Law 114-117).” in https://www.congress.gov/114/plaws/publ17/PLAW-114publ17.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Nuclear Posture Review.” in https://media.defense.gov/2018/Feb/02/2001872886/-1/-1/1/2018-NUCLEAR-POSTURE-REVIEW-FINAL-REPORT.PDF.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Wendt, A.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hite House. 2017.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New Strategy on Iran (October 13, 2017).” in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s-new-strategy-iran/.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White House. 2018a.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Iran Nuclear Deal (January 12, 2018).” in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resident-iran-nuclear-deal/.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White House. 2018b.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s Ending United States Participation in an Unacceptable Iran Deal (May 8, 2018).” in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ending-united-states-participation-unacceptable-iran-deal/.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White House. 2018c.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Briefing on Counterproliferation (September 26, 2018).” in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briefing-counterproliferation-new-york-ny/. Latest update 6 December 2018.

Willrich, M. 1968. “The Treaty on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uclear Technology Confronts World Politics.” *The Yale Law Journal* 77(8): 1447-1519.

Young, O. R. 1982a. *Resource Regimes: Natural Resource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Young, O. R. 1982b. “Regime Dynamics: 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2): 277-297.

Young, O. R. 1991.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Regime Form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5(3): 281-3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JCPOA's Impa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Nuclear Fuel Supply Assurance Regime*

*Yea-jen Tseng***

Abstract

Iran has been advocating the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energy allowing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ossession uranium enrichment technology, which is a core element for nuclear fuel manufacturing, while claiming that it is the right of a sovereign state to ensure its secure supply of nuclear fuel. However, as uranium enrichment is a key technolo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the U. 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are concerned that once such development has been granted to Iran, there is a potential risk for the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fter the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 came into force,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processes for the assurance of nuclear fuel supply had accidently constructed the normative hierarchy of the NPT principles.

By recalling the regim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 law-making for the nuclear fuel supply assurance during the JCPOA negotiations, as well as the agenda-setting initiated by Trump administration's attempt to comprehensively re-deprive Iran's nuclear capability, this article discovers that the great powers that manipulated the NPT regime could input new ideas. These ideas include the assurance of nuclear fuel supply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powers during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which add new precondi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peaceful use of nuclear energy and constrain the rights

* DOI:10.6166/TJPS.201812_(78).0003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paristwo@stust.edu.tw; tsengyeajen@yahoo.com.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under which non-nuclear states of the NPT regime can peacefully use nuclear energy. The hegemony can unilaterally veto the normative arrangement that are against its interests and create extra space for the normative re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Keywords: Non-proliferation, Assurance of Nuclear Fuel Supply, Export Control, Regime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Norm Transition, JCPO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